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

◇ 鲁枢元

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分期与历史定位

据我们考证,“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周扬在1979年第11期《文艺报》发表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文率先提出的。我们倾向于将新时期文学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9年为崛起期;20世纪90年代为转型期;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为综合期。

新时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也就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运动的核心,其历史地位堪与现代文学史中的“30年代文学”相比肩。

二、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转换

为文学定性,差不多总是以往文学理论无可回避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论争中绕不开的问题。

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系统在新时期里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表现为“政治范式”“审美范式”“文化研究范式”这三种范式的轮替。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由社会政治范式转型为审美范式,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从审美范式转型为文化研究范式。两次范式转型带来了文学理论与批评从理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变革。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文学理论与批评总是表达着特定时代人们的文学观念,渗透着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这种时代精神也可以看成认知范式。文学的社会作用更多时候发生在人的感觉、意向、情绪、想象中。它是“柔弱”的,却可以对一个民族的健康成长产生持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它又是“恢弘”的,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对于新时期文学理

论及文学批评实践经验的分析整理,应加强精神向度的开掘,从而让文学为营造国民健全的文化精神生态做出贡献。

三、新时期文学基本性质的多维认知

新时期开始阶段,文学界就以“为文学正名”的方式对以往的文学概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进行了颠覆。这就再次证明,所谓固定的、唯一的、共同的文学本质其实是不存在的。在生机勃勃、丰富活跃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实践面前,超越表象与本质的对立,更多地注视多元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成为观察、阐释文学基本属性的新思维模式。

新的理论视角、新的批评方法以及新的思想潮流完全淹没旧的思维模式,层出不穷的新理论让批评界应接不暇。理论的突破和观念的创新促进文学研究从自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理论批评的预设不再指向“本质”这个唯一的焦点。相对地说,它更多地关注多元因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对于“本质主义”的命名,这种理论预设可以称为“关系主义”。文学的性质、特征、功能必须在包括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宗教学、心理学、生态学等社会文化的关系网络之中谨慎定位。关系只能是历史的产物,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相对物。文学理论关于文学基本属性的研究,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经历了复杂的探索阶段:80年代的勇气、90年代的沉思以及21世纪的调适,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绵延组成了文学性质的认知史。

在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里,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暂时摆脱压抑,精神走向自由。相比之下,90年代更像一个过渡期——从狂欢走向沉思。21世纪之初,文化研究兴起。其产生的综合效应以混沌的气势试图囊括文学理论面临的所有问

60 2018 | 1·河南社科文摘

题,以至于有人担心文学的精英将在文化研究的“乱炖”中日益变得稀薄、模糊。令人欣慰的是,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开拓,文学批评思维模式的转换,同时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种渠道。

我们之所以把以上三点看作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的“三纲”,是因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像是三条线索,始终贯穿在新时期的始末,成为新时期文学坐标上的时间性的纵轴。仔细看一看,三条线索中的各个“层级”又是紧密相互映衬、相互呼应的:时间上的“崛起期”和理论形态上的“政治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本质主义”;时间上的“转型期”和理论形态上的“审美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关系主义”;时间上的“综合期”和理论形态上的“文化研究范式”,与思维方式上的“文化历史主义”。

与“三纲”同行的,又有“五常”。所谓“五常”,这里是指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界长期活跃、成绩突出的五个领域。

1.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

中国文学理论界在新时期伊始,便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再出发,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文革”中以及“文革”前的文艺思想拨乱反正,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即:由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的阐述厘清文学属性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坐实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入手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考察人类审美活动,促使审美实践论文学观诞生;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生产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凸显文学艺术产品的特殊性。

通过对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者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及其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他部分的关联性上来研究问题,把文艺理论和文艺问题纳入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和理论思维空间来考虑,逐步兴起并发展出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兴的、分支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学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进程,体现在回归传统的同时也

在走向世界。回归传统,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吸收中国古代、近现代文论的优秀研究成果,在中国的国土上深扎根;走向世界,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要继续坚持对国外优秀文论的学习、引介和研究,让中国文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进一步融入世界。

2. 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论作为文学理论的“发源地”“资源库”“生长点”,作为文艺批评的“元素”“对象”“参照系”,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然,实现这样一种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讲,都无法回避一个前提:即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未经历“现代转换”的古代文论是无法直接介入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活动的。

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与其说是一则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场域,一种在历时性上时间与时间对话,是当代学者与古代文人相互寻思乃至质疑的场域;也是本土话语与西方话语相互磨合乃至渗透、交融的场域。在这样一种场域里,文学正在向文化开放,后现代主义者正在解构曾经的建构企图;而多元的,跨学科的思维形态正在敞开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在这样一种愿景中,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3. 新时期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的繁荣,其存在形式上的主要表现,是理论形态的多元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1984年作为“方法年”,实际上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理论新学科建设的里程,也为文艺学的学科跨界研究拉开了序幕。作为一个宏观的多元概念,文学可以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以是作家或人物心理世界的展现;文学表达离不开语言支撑,文学意蕴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意识等的渗入;文学叙事难以回避全球化生态危机等世界难题,文学素材的取舍也总会跨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凡此种种,决定了对其进行文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伦理学、文学生态学、文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可能,并且业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河南社科文摘·2018 | 1 61

4.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的“方法热”;1990年代的“后学热”;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热”。30多年的批评实践收获了丰富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的成果,也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带入世界,形成跨文化对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0年代之后,大众传播以其巨大的能量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从而形成文学批评的新格局。相对于学院批评的曲高和寡,“传媒批评”,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商业市场支撑下对那种刻板的、学究式的批评不失为一种有力的反拨。它使文学批评通过大众传媒走出象牙塔而直接面对大众成为可能;它促使批评对文学现实迅速地作出反应。但是,对大众传媒要求的通俗活泼的语言方式的顺应,可能导致文学批评在产生快感的同时将快感作为目的,文学批评可能成为即时消费、即用即弃的“广告之”。文学评论如果仅仅作为“时评”而放弃对恒久精神价值的关注,将造成美学感受的迟钝及对于终极价值追求的丧失。

5. 大众文化兴起与文学批评的危机

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影视剧、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成为文学、艺术表现的主要载体,当代社会审美表现出强烈的消费性、视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征。“大众文化”的浪潮很快席卷中国大地。大众文化迎合了人们释放本能快感的需求,但也放弃了文学艺术对于人类精神“救赎”和“提升”功能。大众文化的兴起确实拓展了文学艺术批评实践的范围,丰富了文学艺术批评的渠道。随着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作品、城市景观建设成为当代社会审美和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文化研究、尤其是媒介文化研究已经内化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视角。文学文本的首要意义已不仅指向“美的艺术”本身,而是指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文学批评也不只是简单地揭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征,而是涉及社会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大众文化的兴起导致了“文学”“艺术”定义的变

化,为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带来新的危机。文学审美价值体系的重估和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我们仍有必要作出深入思考:如何立足于中国自身的文学批评传统,结合西方文化理论和当下大众文化的状况,创造性地建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法则与体系,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我们始终认为,对于所谓新时期的文学思潮而言,20世纪80年代不但是崛起阶段,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精神与情感、气质与风范,是新时期的精神内核。

综上所述,“新时期文学”就其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体现的主要精神内涵与社会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拨乱反正,清算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下的文化专制;第二,解放思想,总结历史教训,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第三,向世界开放,不惮于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与方法;第四,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尊重文学艺术自身的内在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各具风格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呈井喷状诞生;第五,文学艺术,甚至包括诗歌在内,对当下的政治、经济生活往往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文学在民众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

我们认为,自1979年至今延续30余年的“新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思潮,已经结束。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时期文学”作为一个“思潮”已经开始退潮。21世纪开启之后的十几年,“新时期文学”以上五点主要内涵,有的已经淡化,有的已经转移,有的已经彻底消失。仍旧沿用“新时期文学”已经失去现实的根据。

作者简介:鲁枢元,河南开封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摘自《中州学刊》2017年第5期,原文约7200字)

62 2018 | 1·河南社科文摘